

咸阳上召窑秦陵墓主 或为华阳太后

9月18日,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,考古工作人员基于咸阳陵区内4座秦陵园的考古发现,通过空间分布与类型学研究,将其划分为“长方形陵园组”和“近方形陵园组”。考古工作人员在此基础上,结合历史文献、考古材料与相关研究成果,运用排除法,对上召窑秦陵墓主身份进行辨析,最终推测墓主为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。

上召窑秦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原上召窑村南。2018年,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,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项目用地内的文物保护单位“恭陵”进行了勘探,确认其为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“亚”字形大墓。2022年,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

陵园北部开展了考古发掘,并进行了补充勘探,基本厘清了陵园的整体布局结构。因该陵位于原上召窑村范围内,故定名为“上召窑秦陵”。

而上召窑秦陵的考古工作自启动以来,便受到了学界持续关注,其墓主身份的判定更是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。该项目现场负责人赵汗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在上召窑秦陵的发掘工作中,考古人员共发掘出土器物258件(组),材质包括陶、铜、铁、铅、玉、石、玛瑙、琉璃、料珠、骨、蚌等。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,器类包括鼎、盒、壶、罐、盆、釜、釜等,部分器物戳印有“咸广里高”“咸重成未”“咸宜都次”等陶文。铜器多出自附葬墓,包括鼎、壶等,其中一件铜鼎刻有“宋氏”铭文。此外,为了更深层次地辨析上召窑秦陵墓主的身份,考古工作者同时也梳理了相关历史文献和既往研究,结合咸阳陵区战国秦陵的类型学比较,运用排除法对该墓墓主身份展开分析。

据赵汗青介绍,研究人员此次对陪葬墓人骨的碳十四测年,显示其年代为公元前389年至前208年。综合墓葬形制、陵园结构及出土器物特征判断,上召窑秦陵的年代当为战国晚期,属于秦王级别的陵墓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此前在咸阳原上已发现周陵镇秦陵、严家沟秦陵和司家庄秦陵三座秦陵园,上召窑秦陵是这一区域发现的第四座。通过比较不难发现,上召窑秦陵与司家庄秦陵在陵园形制、布局结构等方面高度一致,二者年代或较为接近,墓主之间的关系亦或较为密切。结合文献记载与战国秦陵埋葬制度,研究人员推测上召窑秦陵的墓主可能是战国晚期秦国的一位太后。这一发现不仅为咸阳陵区秦陵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,也为破解咸阳原秦陵墓主身份之谜提供了新的线索。

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任俊丞



琉璃器



水晶器



骨器

咸阳礼泉县唐昭陵陵山上 发现山石室及石券窑



小冠俑

陶鼎

冠冠骑马俑

9月17日,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,考古人员对唐昭陵陵山上凿山为窟的石室、石条砌筑的石券窑及栈道等遗迹展开调查,清理了部分遗迹,获取了一批遗物。经过分析,确认其时代为初唐时期。9座石室可分为两类,1座规模较大者可能为高等级陪葬墓,其余8座可能为留守在昭陵寝宫内宫人的墓葬。石券窑的功能推测与墓葬中放置明器的便房或小龕相似。这批资料对于昭陵陵园布局与唐代陵寝制度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。

9座石室中较大者,应为徐贤妃墓或长孙皇后暂厝处

唐太宗昭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九嵕山,在陵山山腰东部、东北部、南部、西南部分布有多组石室、石券窑遗迹。1965年,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昭陵石室、石券窑进行初步调查并采集部分遗物。2002年8月,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清理昭陵

北司马门建筑遗址,并对陵园相关遗迹进行全面调查,最后确认该遗迹时代应为初唐时期。

领队张建林在接受采访时介绍,此次对昭陵的发掘共发现9座石室,主要分布于陵山南部,且9座石室可分为两种类型。其中一座石室形制较另外8座石室相对特殊。该石室单独开凿于九嵕山南侧偏东崖壁,海拔和规模均高于其余8座。在后续的发掘中,考古人员在该石室内出土了隋唐时期的宫廷乐器编磬,并发现该器物与隋炀帝墓中出土的铜编磬形制较为相似,结合该石室位置又接近主峰,考古人员推测该石室应当是昭陵陵园内一座大型重要陪葬墓,并进一步推断可能是陪葬昭陵的徐贤妃之墓,或者是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暂厝之处,即临时安放棺槨、并未最终下葬的场所。另外8座小石室分布位置较为集中,形制、规模均相近,且具有类似墓道、墓室的结构,考古人员推测应是留守在昭陵寝宫内较高品级宫人的墓葬。

石券窑或为昭陵贮藏明器的外置便房类场所

除石室外,考古人员还在昭陵中发现了石券窑,据张建林介绍,石券窑原有3处,现存2处,坐落于九嵕山主峰东侧陡坡地带。第一地点保存较好,窑址内出土陶俑、陶器等遗物残片。第二地点则损毁严重,仅存局部石块基础残迹及人工开凿山体、填垫地面的痕迹,残存基址附近出土的陶俑残片,与第一地点出土遗物完全相同。此外,受山体陡峭、灌木密集影响,考古人员在石券窑与石室的崖壁间,发现4处断续分布的方形或圆形石孔,应为残留的栈道遗迹。石券窑出土遗物具备贞观年间器物特征,遗迹内未发现人骨、棺具、棺床、壁画及镇墓石煞俑,可排除墓葬属性,结合初唐皇室墓葬便房贮藏明器的制度与昭陵相关文献记载,考古人员认为石券窑很可能是昭陵贮藏明器的外置便房类场所。

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任俊丞

西安发现唐中宗户部尚书李承嘉墓

9月18日,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,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长安区发掘了唐代户部尚书李承嘉墓,出土墓志一合。志文详细记载了李承嘉的历官,对唐代文官职务迁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。同时,也反映出唐中宗神龙年间的复杂政局,可与史书互证。志文中关于墨制授官的记载和行文中的细节,反映出撰者崔湜对李承嘉的主观态度。

立官四个阶段
政坛的投机者

2017年1—4月,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大居安村项目建设,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项目用地范围内的6座唐代墓葬进行了发掘。

该发掘项目负责人苗轶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考古人员在此次发掘中通过墓志得知,其中一座唐墓墓主为唐中宗户部尚书、襄武郡公李承嘉,该墓出土随葬品60件(组),其中俑47件(组),以动物俑为主,人物俑及骑马俑较少。墓道至墓室原通绘壁画,由于多次盗扰破坏,加之水淤浸泡等因素影响,现仅存少量,但墓志尚存。

考古人员根据墓志得知,墓主李承嘉景龙四年(710年)正月葬于高阳原,春秋六十,未记卒年。依此推算,李承嘉生于永徽元年(650年)左右。参考墓志与史书所载其生平经历,可将其历官大致分为四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时,他不过为地方基层僚佐官员,墓志称其“佐是四邦”,以对应其在并州、晋州等四个地方州府的僚佐经历。李承嘉在此时历外任以练庶务,为后续调入京城奠定基础。而后,李承嘉便进入京县与台省的迁转阶段,墓志记载,他显赫的门第出身给他带来了良好的从政条件。任职期间,他升迁为台省郎官与京畿县令。而命运的转折点在于神龙元年(705年),张柬之、敬晖等五大臣发动了神龙政变,政变之后,朝廷形成了多方角力的混乱格局。李承嘉正是这场乱局中的政坛投机者。墓志记载他“赐铁券,恕十死”,根据史书记载,当时获此殊荣的基本上都是神龙政变的功臣,李承嘉也在其中,因此,考古工作者推断,他很可能也直接参与了神龙政变,至少也是事后有拥立之功。

据墓志记载,李承嘉在看清朝堂局势后,很快便主动投靠武三思麾下,成为武韦集团打压异己的一把利刃,在神龙年间的数次政治清洗中都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。尤其是后来的“五王”一案,时任御史大夫的李承嘉彻底投靠了武三思,成为构陷五王的急先锋,事后得到的好处也显而易见,授金紫光禄大夫,

进封襄武郡公,并得到韦后赏赐。后于神龙二年(706年)七月,李承嘉被萧至忠参劾贬官。最终病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据其他资料记载,萧至忠神龙初年亦依附武三思,“自吏部员外擢拜御史中丞。迁吏部侍郎,仍兼御史中丞。恃武三思势,掌选无所忌惮,请谒杜绝,威风大行”。其时萧、李均为武氏党羽。而萧至忠弹劾李承嘉这一现象的出现,考古人员认为,既出于私怨,也反映出中宗朝政局的暗流涌动和各方势力内部的复杂关系。

墨制授官
官方毁墓

该项目的项目成员王亮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考古人员在墓志中还发现了几处值得玩味推敲的地方。据悉,墓主李承嘉墓志的撰写者是唐代著名文人崔湜。此人作为皇家御用文人撰写墓志铭是很正常的事。然在墓志行文之中,有考古人员发现,墓志内有两次特意点明的“墨制”授官。《唐朝诡事录》里便有一个苏无名坚决不当“斜封官”的情节。因为没有经过正常的任命程序,所以为人所不齿。唐代墓志中提到墨敕授官的情况比较少。但崔湜在李承嘉墓志中特意两次标出“墨制”,似乎正是影射李承嘉借攀附权贵而青云直上的官场经历。

其次,志文中虽出现“赐铁券,恕十死,加实封四百户。绢五百匹、瑞锦一张”。然而从历史上,赐铁券和赐绢锦是不同时期的两件事情。赐铁券的时间应是神龙政变之后,赐绢锦则是神龙二年李承嘉构陷张柬之等人之后,韦后赐予的奖赏。“五王”一案给李承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宠,但也是他官场生涯中的最大污点。研究人员推测,崔湜本人作为背刺五王又设计加害的幕后推手之一,对这样一段黑历史,亦不愿提起。故墓志讳言其事,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而“官方毁墓”这一现象是指官方(古代为皇帝或朝廷,现代为政府)对特定人物死后的墓葬进行有组织、大规模的刻意破坏行为。它不同于普通的盗墓或自然破坏,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、惩戒或威慑目的。李承嘉墓便是如此,考古人员发现,其墓曾遭严重破坏。石门仅存部分残块,砖室几乎被毁,甚至连铺地砖及棺床

砌砖都被揭掉破坏。墓志残破,墓主尸骨无存。而这样的结局,也恰恰印证了这种政治投机的风险。李承嘉墓葬损毁严重,和此前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如出一辙,因此,考古人员也由此推测,该事件应发生在后来唐睿宗清算武三思一党的时期。

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任俊丞
本版图片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



立鸡